

从哲学角度辨析信息化作战指挥

■邹振宇

当前,世界军事革命浪潮汹涌澎湃,作战指挥领域已发生深刻变革。对作战指挥理论认识 and 实践中遇到的许多矛盾现象,需要人们从哲学的角度进行深入分析,通过对作战指挥诸要素的内外联系进行辩证思考,揭示信息化作战指挥的内在本质和规律,探索信息化、智能化作战指挥的根本原则和根本方法,不断提高指挥效益。

(一)

作战指挥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体,它的主要特性和发展趋势是由这个统一体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来决定的。信息社会之前,作战指挥主导要素不管其外在形态如何演变,都属于物质、能量主导型。正如拿破仑所言:“用总量乘以速度即可估算出一支军队的力量,就像计算机机械运动的总量那样。”机械化时期可谓是物质、能量主导型的最高形态。指挥力的发挥,主要是围绕物质与能量的投送展开。指挥装甲集群的闪电突击、大机群的战略轰炸等,无一不是把具有杀伤性的物质与能量尽可能多、尽可能快、尽可能猛烈地投向敌方,但指挥效益不高。

辩证唯物主义者认为,在对立统一的矛盾体中,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作战指挥主导要素的转化同样遵循这一规律。伴随作战指挥自动化器材为主要工具的信息要素,经过不断发展和完善,正迅速从一种分散性、局部性和辅助性的要素转化为统领物质与能量的主导要素,这必将推动作战指挥迈向信息化时代。这种背景下,指挥控制的信息化、武器装备的信息化和作战系统的信息化,极大地提高了指挥效能,促使指挥力出现质的飞跃。

信息转化为作战指挥的主导要素后,将成为引领指挥活动的主线和灵魂,谁夺取了战场指挥信息的主导权,谁就掌握了战场指挥的控制权。但不可否认的是,信息要素的主导作用,并未使物质与能量要素退出作战指挥领域,它们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换言之,信息的主导作用,是在物质与能量基础上的主导作用,离开了物质与能量要素,信息要素的主导作用也就失去了应有之义。比如,指挥信息系统功能的发挥,就是建立在传统指挥控制系统的基础上,通过信息化改造,依托信息的链接功能,使物质与能量资源在信息的

调度下更灵活、更协调、更自如地配置与流动;指挥信息系统可以从众多的武器平台、传感平台和指挥控制平台中汲取信息,从而实现信息共享,达成自主协同作战。因此,信息要素的发挥,离不开以物质与能量为基础的机械化平台,只有与之相融并进,才能发挥信息的“倍增器”作用。因此,在未来作战指挥活动中,既要拥有全时域、全维度的信息主导,发挥各种高性能武器装备和智能软件系统的效能,又要充分发挥好物质与能量的支持作用,确保信息主导有“体”可依。

(二)

事物只有经过量的不断积累,达到一定程度时才能产生质变。作战指挥的跨越式发展,就是通过量的积累达到某种程度而发生质变的结果。这种量的积累和质的飞跃,不是旧的主导要素的积累,而是新的主导要素的积累和在此基础上质的变。

作战指挥的跨越式发展,是以发达国家的军事指挥技术与理论为参照系,在发展过程中跨过某些环节和过程,实现与先进技术和理论的同频共振。我军作战指挥理论的发展一直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经过几十年的积淀,形成了当前包括作战指挥基础理论、作战指挥应用理论、作战指挥技术理论、作战指挥史学理论等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较好地指导了作战指挥实践。这种发展模式,是由我军作战指挥的历史发展进程决定的。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未来战争形态将是信息化战争,并向智能化战争演进。目前,我军总体上还处于机械化阶段,信息化要素尚不齐备,又面临智能化战争的严峻挑战,这就是我军作战指挥实施跨越式发展的现实基础和逻辑起点。我军的跨越不能离开这个最基本的现实,必须在量的积累基础上寻求质的变化。因此,作战指挥在渐进式发展的基础上谋求跨越式发展,是我军现实发展的必然要求。

未来作战指挥领域的跨越式发展,源于丰富的作战指挥实践,也基于深厚的哲学基础。只有从跨越式发展的指挥实践背景和理论依据出发,正确把握我军作战指挥理论的发展方向,科学谋划我军作战指挥理论跨越式发展的对策和措施,才能确保我军作战指挥的科学发展。一方面,要以信息化为主导,

实现作战指挥发展由机械化向信息化的跨越。随着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科技迅猛发展,人类社会正由工业化迈向信息化,作战指挥形态也发生了深刻的时代转型。从我军现状来看,打赢信息化战争与作战指挥信息化程度较低的矛盾,已成为我军作战指挥发展的突出矛盾。因此,紧紧抓住信息化这一主要矛盾,坚持以信息化为主导,客观上必将促进我军作战指挥由机械化转向信息化。

另一方面,要以机械化为基础,实现作战指挥发展走信息化与智能化复合发展的道路。用辩证的眼光审视信息化与智能化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信息化与智能化并非两个孤立的、互不关联的事物,也不是两个独立、并行不悖的发展阶段。智能化并不需要建立在走完信息化发展全程的基础上。实践表明,当今世界军事强国在努力建设信息化军队同时,也在努力加强智能化建设,走的就是信息化与智能化复合式发展道路,当这种复合达到相当水平的时候,其指挥方式、指挥手段等必将发生变化,从而引起作战指挥形态向更高级阶段转变。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而且有可能在现有阶段,通过信息化主导,使信息化与智能化复合发展,实现作战指挥发展向智能化的跨越。

(三)

事物的发展是由内因决定的。指挥观念体现着指挥人员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它的形成与发展同样遵循内因决定外因这一基本规律。观念的更新既是社会变革行为产生的第一步,也是最为关键的一步,更是最困难的一步。英国军事家利德尔·哈特认为:“每一种新观念要想获得大家的接受,其最好的办法是设法把它表述出来,说明它并不是什么崭新的思想,而是‘古已有之’的旧观念,只不过开始有些现代化罢了。”可见,更新作战指挥观念的关键在于驱除旧观念的束缚。

恩格斯曾说过:“当技术革命的浪潮在四周汹涌澎湃的时候,最需要的是更新更勇敢的头脑。”这里的“更新更勇敢的头脑”,讲的就是变革的意识和勇气。历史表明,一种思想的解放,一种观念的更新,往往去打开一条新的通道,把人们引进一个全新的境界。面对信息时代,实现作战指挥观念的更新,把握未来作战指挥的本质特点、内在规律等基

本问题是关键。因为,作战指挥实践活动从来就不是任意的或无目的的盲动行为,而是具有明确的目的、强烈表现主观意志的一种改造客观军事世界的活动,自始至终受到人们认识水平的影响和制约。如果军事认识是正确的,那么依据这种认识去行动就会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反之,就可能误入歧途。

从哲学层面上来分析,不难发现,在作战指挥观念更新的过程中,革新军事思维方式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一方面,要克服守旧的思维习惯,提倡开放的、创新的军事思维方式。优良的传统固然要继承,但要随着作战指挥环境与条件的变化而有所扬弃,并根据信息化作战指挥的高度活跃性、不确定性的特点有所前进。否则,即使再好的经验亦可能成为未来作战指挥变革发展的障碍。另一方面,要摒弃片面的、绝对的思想倾向,提倡全面的、辩证的军事思维方式。凡事均应“杂于利害”,看到正反两个方面,不能说新作指挥观念好,就认为它没有一点缺陷,也不能因为新作指挥观念得不到人们肯定,就认为没有必要进行研究。因此,必须弄清问题的性质,如果是属于方向正确但具体观点不恰当时,一定要避免因个别观点不当而全盘否定正确方向的做法。

此外,要破除静止的、停滞的思想观念,提倡动态的、发展的军事思维方式。作战指挥发展史表明,“如果武器改进了,技术有了新的进步,那么军事组织的形式、军队指挥的关系也会随着改变。”因此,作战指挥观念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更新的动态过程。一旦出现新技术所能引发作战指挥形态变化,就有可能带来作战指挥观念的更新,必须随时以新的姿态来正视作战指挥观念的更新。

(四)

事物发展是新质对旧质的否定,不断的否定使得事物不断向前发展。否定不是对旧质的全盘抛弃,而是扬弃,即在旧质基础上的继承和创新。作战指挥理论是随着时代的变更和战争的演变而不断发展变化的。正如德国军事理论家毛奇所说:“不能忽视以往战争的经验,但必须牢记,它不能成为当今时代的规范。这些战争距今已有数十年甚至数百年,在此期间,无论是政治状况,还是战略形势都起了变化。因此,要想获得预想的结果,唯一的办法

国防漫谈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费斯汀格有一个很出名的判断,被称之为“费斯汀格法则”:生活中的10%是由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组成的,而另外90%则由你对所发生的事情如何反应所决定。其内在含义是:我们确实无法控制发生在我们身边的10%,比如我们无法阻止自己一天天变老,也无法阻止地震发生;有时一个偶然事故就让我们遭遇烦恼的堵车,不经意的一个失误就会让我们耗费大量时间来弥补。但另外的90%就不同了,你完全能决定自己的喜与悲、静与躁、进与退等。

希腊哲学家爱比克泰德讲过,“重要的不在于发生了什么,而取决于我们如何对待。”古罗马智者塞伯利基也有一句名言:“两个人从同一座城堡内往外看,一个人看到的是泥土,另一个人看到的是星星。”从认识论的角度讲,看待事物的角度和态度不同,得出的结论就会不同。同样,在军事变革史上,因站立的角度与所持态度的差异,从而导致结果不同的例子不胜枚举。

1938年,德国武装吞并奥地利,首次使用装甲师,由于技术和保障上存在许多问题,大批的德国坦克半路抛锚,出了不少洋相。消息传开,欧洲一些国家

善用「费斯汀格法则」

■张西成

战略论苑

(作者系陆军指挥学院作战指挥系参谋部工作教研室主任)

军队的决策者对集中使用坦克出现了不同反应、迥异做法。其中,英法停止了组建旅级以上装甲部队的尝试,苏军也停止了机械化集团军,而德军自己却不走回头路,发现坦克,积极改进,摸索出了一套新方法,使坦克集群在二战初期出尽风头。而那些武断地否定坦克集群作用的军队,则无不在德军“闪电战”面前败下阵来。

任何科学技术都是一把双刃剑,关键取决于我们如何看、怎么办。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推广运用,极大地激活了军事领域的“正能量”,但也引发不少“副作用”。对于这些“副作用”,无疑需要我们警惕,但决不可因噎废食。早在1803年,美国发明家富尔顿在塞纳河上成功试验了蒸汽船,拿破仑曾感慨说:“这个事实可能会使世界的面貌为之大变。一个伟大的真理,千真万确的事实,已经摆在我们的眼前。”然而,一回到现实中,拿破仑的态度立马来个180度的大转弯,感到一旦使用上蒸汽战船,必然会带来不稳定、不确切因素,势必导致业已具备的海军战斗力急剧下降,于是拒绝采用富尔顿建议,继续使用过时了的帆船战船。从拿破仑“叶公好龙”这一点看,如今我们也能找出一些对待新生事物的身影。

态度反映境界、折射素养。美国入英格尔斯曾经说过:“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入,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入,它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中的入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这就告诉我们,面对新时代的新生事物,如若没有人的价值尺度、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情感方式等文化心理方面的觉醒,到头来就如同心理学研究所阐述的那样“隔着一层无知之幕”。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人们总是倾向于对自己不了解的新生事物负面的解读,更不用说实现革命性变革了。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任何人都无力阻挡。卡尔·波兰尼就此提醒人们:“变迁的速度与变迁自身方向相比并不显得不重要,虽然常常是不依赖于我们意志的,但我们所能承受的变迁发生的速度却可以由我们来控制的。”毫无疑问,当今世界范围内信息技术革命的洪流我们无法左右,但对待信息技术的方式和为我所用的程度则由我们决定。人不可逆势而动,更不能与潮流为敌,用好“费斯汀格法则”,拥有阳光的心态、创新的品质、开拓的智慧,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前程将会变得精彩纷呈。

工作研究

(作者系甘肃省庆城县入武部部长)

既要发现问题更要解决问题

■褚振江

度存在。一是看问题“色盲”。不敢正视问题,刻意回避矛盾,对群众的呼声不是分析原因,寻找解决途径,而是“色盲”加“散光”,嫌麻烦、图省事,不闻不问。对别人的问题夸夸其谈,对自身的症状讳莫如深、闭口不谈或避重就轻,自我感觉良好。二是摆问题“作秀”。动辄甲乙丙丁,问题一摆一串,把发现和梳理问题当作成绩,把检讨问题作为工作务实的招牌,只讲问题不解决问题,热纸上谈兵,乐当“甩手掌柜”,表态多调门高,行动少落实差。三是见问题“绕道”。不愿承担责任和义务,习惯于上推下卸,遇到困难就拐弯,有了风险就“转嫁”,甚至一味归结为外部因素,对单位的历史遗留问题,或新官不认旧账也不理旧账,推三阻四、挑肥拣瘦,能躲则躲、能拖则拖。长此以往,造成矛盾问题积重难返,问题还是那些问题,弱项还是那些弱项。

领导就是领路引导,干部就要先干一步。解决棘手问题是极难攻克的堡垒,需要有“舍我其谁”的勇敢,“一夫当关”的胆略,“功成不必在我”的胸怀。当年,焦裕禄带领兰考县人民“治三害”期间,背着干粮,扑下身子,埋头苦干,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感人事迹,为县委书记立下标杆。面对福建东山这座人间荒岛,谷文昌敢于啃硬骨头,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办事,不仅给海岛留下一条绿色林带,更在人心铸起一座永恒丰碑。孔繁森、杨善洲、廖俊波……正是这些不同时期涌现的先进党员,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自觉实践以身许党为民的价值追求,彰显了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貌。

“为官避事平生耻。”面对工作中的重难点问题,各级干部要带头认领、带头领责、带头坐镇,主动出击,贴身紧逼。要用历史眼光看待处理问题,创造性地解决复杂问题,一茬接着一茬干,一棒接着一棒跑。对列出的问题清单,既“诊脉”又“开方”,更要问“疗效”,严防把罗列问题当成解决问题的不良倾向。坚决围剿不问不问的官僚主义,不较真碰硬的好人主义,不真刀实枪的形式主义。

牵住安全工作的“牛鼻子”

■孙启涛

安全管理是军队建设经常性、综合性的基础工作,其经常性、综合性、基础性属性,决定着其有规律可循、有共性可寻,这种规律和共性就是安全工作的“牛鼻子”。安全管理工作中,安全评估、安全职责和安全问责就是安全工作的“牛鼻子”,牵住它就抓住了安全工作的要害,把握住了安全工作的根本。

抓安全评估是前提。《安全条例》要求各级在组织重大活动、执行危险性任务前,必须组织安全风险评估。这是因为军队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大都与处理突发事件、应对各种灾难灾害有关,具有高度的动态性和风险性,通过科学分析研判,预测重大活动和任务中的危险有多少、风险程度有多高、安全概率有多大,进而研究采取规避、降低和控制风险的措施办法,就能推动各项安全工作落到实处。

然而,从实践来看,一些单位对事前安全评估工作,讲起来重要,忙起来不要,没有很好地贯彻落实。无论做什么事,安全风险都是客观存在的,它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把握和运用好军队风险评估和管理规律,从多层次、多角度、多环节去研究应对风险举措,始终做到心中有数、心里有底,才能使隐患消于未萌,事故止于未发。特别是对诸如新装备列装、新训法上马、新战法实施等科技含量高、风险级别大的活动任务,依靠科学分析洞察,运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组织安全风险评估,就能增强风险预测的可靠性,进而大大降低事故发生概率。

落实安全职责是根本。《安全条例》赋予了部队各级各类人员抓安全工作的职责,一个单位只有大家尽职

尽责才能确保整体安全。安全工作通常依靠经常性的安全教育、安全训练、安全建设,来强化官兵意识,提升防范能力,构建安防体系。只有广大官兵把所学到的安全知识和技能转化为做好安全工作的能力素质,结合运用到具体工作实践,才能及时消除安全隐患、降低安全风险,切实增强安全系数。

“一语不能践,万卷徒空虚”。剖析部队近年来发生的安全事故,从根子上讲,无不与一些单位和人员作风不扎实、履职不到位有关。有的只会当“扩音器”“留声机”,抓安全工作仅仅停留在“喊”的层面,空泛的表态多,实际的动作少;有的只会当“二传手”,对上级指示精神,部署要求传达了、转发了、安排了,本级的任务就算完成了,职责就算尽到了;有的只会当“复印机”,抓安全工作满足“依葫芦画瓢”,教条式地抓落实,摸不清实情,结合不了实际。安全工作说到底是一项非常实在、非常具体的工作,对于安全教育怎么搞、安全技术怎么训,以及上级的普遍性指导如何在本单位量化、具体化,必须依靠广大官兵实实在在地做、老老实实地抓,其成效绝不在于空喊口号、空耗时间、空转工作。“安全重担众人挑,人人肩上有指标”,各级各类人员只有履职尽责、安全工作落实到人,才能成为安全管理的第一线的前哨和尖兵,群策群力,群管群教,群防群治,才能把握安全工作主动权。

抓安全问责是保障。《安全条例》明确了对发生责任事故和严重违规违纪问题的单位和个人实施责任追究的原则办法,目的在于严明纪律,教育责任

者和部队,强化各级各类人员履职尽责意识。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建立安全工作问责机制,是经过实践反复检验、行之有效的制度方法,通过严格的责任追究,促使安全职责落实,是确保部队安全的保障。

然而,在安全工作问责过程中,推责卸责和不尽责的现象并不少见。有的只怕出大事,对一般的违规违纪问题视而不见,只要上级关注不上、责任追究不到自己身上,就“你好我好过去拉倒”,对问题既不查处问责,也不整治纠正;有的在事故和严重违规违纪问题发生后,避重就轻,一味避重就轻,大情小报,重情轻报,急情缓报,围绕自身承担的责任怎么变小、问责怎么变轻,千方百计查找主观以外的原因,除人之外的物和环境因素。治军得之于严、失之于宽,有错不纠,难免百弊丛生。坚持权责统一,严把执纪问责的尺子,对部队安全管理中发生的一般违规违纪问题,依据制度规定给予积极的矫正、纠正,对责任人给予恰当的责任追究,把住的是事故、严重违规违纪问题的源头,最终避免的是更大责任的承担。对因懒政庸政怠政和失职失责渎职,导致发生责任事故和严重违规违纪问题的人,要依法依规严肃追究查处,惩戒当回事人、警示多数人,维护的是规章制度严肃性和权威性,是在更大程度地巩固安全工作防线。

(作者系甘肃省庆城县入武部部长)

思考笔谈

敢担当、有作为是我们党先进性的体现,也是检验领导干部对党是否忠诚的标志之一。“大事难事看担当,逆境逆境看襟度。”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讲的都是为官干事要敢担当、尽好责、善作为。

然而现实生活中,有意回避、躲避、逃避矛盾问题,懒政庸政怠政等现象,在一些单位和党员干部身上还不同程度